



非营利组织创业与发展

——孵化器、跨部门合作与市场导向



蔡 宁 孙文文 江伶俐 著

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丛书

非营利组织创业与发展

——孵化器、跨部门合作与市场导向

蔡 宁 孙文文 江伶俐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非营利组织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约束这一现实前提出发,借鉴资源依赖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提出非营利组织可能的战略选择:孵化、与企业合作、市场导向。针对第一种战略选择,本书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了我国 NPI 对 NPO 的作用机理,并结合案例研究阐述了 NPI 的孵化器功能;针对第二种战略选择,本书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对非营利组织与企业的合作动因、效能机制、风险成因及控制进行了深入研究;针对第三种战略选择,本书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对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与绩效间的关联机理进行了诠释和实证。最后,本书针对非营利组织在不同战略实施中面临的问题,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提出了我国非营利组织健康发展和功效发挥的政策建议。

本书适合于非营利组织的研究者和对非营利组织感兴趣的读者阅读,也可供政府部门的工作者、非营利组织的经营管理者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营利组织创业与发展:孵化器、跨部门合作与市场导向/蔡宁,孙文文,江伶俐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丛书)

ISBN 978-7-03-040094-9

I. ①非… II. ①蔡… ②孙… ③江… III. ①社会团体-经营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C9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5502 号

责任编辑:魏如萍 / 责任校对:桂伟利

责任印制:阎磊 / 封面设计:陈敬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骏杰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 年 4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1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3

字数:262 000

定价:5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丛书” 编委会

顾 问	许庆瑞	马庆国		
主 任	吴晓波			
副主任	陈 劲	魏 江	顾新建	
委 员	(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 宁	杜 健	郭 斌	
	金 珺	石涌江	寿涌毅	
	张 钢	郑 刚	朱 凌	

总 序

“十二”五伊始，我国进入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期。特别地，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深化，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和创新能力缺乏的痼疾进一步显现，加快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已经成为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成败的重大国家战略之一。

“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研究是兼容战略管理、技术管理、营销管理、信息管理、组织行为理论、项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系统分析以及产业经济学等经济科学的集成式管理科学学科领域。随着创新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技术变革经济学、技术创新管理学、组织学习与学习型组织理论、知识管理学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围绕创新管理和持续竞争力的相关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乃至工学的重要学术研究领域。而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所进行的大规模制度变迁和产业升级、发展模式转变，为开展相应的重大现实问题导向的理论前沿研究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孕育着实现具有世界性学术前沿意义的重大理论创新的历史机遇。

当前，创新管理领域出现了四大趋势，即开放式创新的出现、创新的全面化、用户驱动的创新、设计驱动的创新。近两年创新发展研究的焦点，越来越转向全球化背景下的创新体系建设、面对全球竞争的产业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应对全球竞争的产业转型升级等学科交叉性的前沿问题。

在实践中，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资源消耗型增长模式所形成的隐患加速突显。三大瓶颈严重地制约着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即过度依赖重度消耗自然资源（尤其是矿物质能源）和人口资源所形成的“资源瓶颈”；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过度依赖外来技术和外资的“拉美化”增长所导致的“自主知识产权瓶颈”；当代科技革命所要求的现代管理范式转变与大量企业和部门的基础管理水准仍低于泰勒制科学管理要求的双重“管理升级瓶颈”。显然，没有创新的推动，中国国家、区域、产业和企业各层面上的竞争力就无法提升，就不能形成真正的持续竞争力。

为此，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实现重大的战略性转变：一是竞争力基础的转变，即从自然资源的密集消耗向知识资源的创造性应用转变；二是资源利用途径的转变，即从封闭环境下的区域性资源消耗向开放环境下的全球资源共享转

变；三是创新模式的转变，从引进、模仿性创新向原始性创新、突破性创新、完善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构建等自主创新模式转变。

浙江大学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研究中心是“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是我国创新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基地，以其最早在国内开展技术创新管理和持续竞争力研究，形成了体系化的丰硕研究成果和广泛的国际协作网络著称。创新基地现有全球化制造与创新，创新管理与政策，服务创新与发展，电子商务与新兴产业，非营利组织创新与管理，知识、专利和标准战略等六个研究所，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及企业管理、公共管理等省级重点学科，覆盖5个博士点、2个博士后流动站。在中国电子科技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等建有分基地。

围绕“构筑大平台，凝聚大团队，承担大项目，培育大成果”为核心的“985工程”建设指导思想，创新管理基地已基本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平台，拥有一支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研究团队，并聘请了来自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华威大学、莱斯大学等的多位国际知名学者为“浙江大学光彪讲座教授”。在承担国家级重大项目、国际重大合作项目等高水平研究方面不断取得重要的突破，取得了包括成功获批国家重点学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建设成果。

基于长期脚踏实地的实证研究，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创新基地在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管理研究与探索中，创造性提出了以“二次创新—组合创新—全面创新管理”为主线的原创性创新管理理论和范式，形成了独特的以中国实践为基础、与国际理论前沿接轨的特色创新管理理论体系，为我国企业的有效创新管理实践，为各级政府自主创新相关政策的设计、制定和执行，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对推动我国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与实践作出了突出贡献。

针对我国当前面临的产业转型升级与社会贫富加速分化的重大挑战，从2008年起，由浙江大学创新基地的研究团队牵头，与中国科学院专家、印度创新管理专家组成课题组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对欠发达地区“创新推动包容性发展”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阶段性成果，在国内外引起了重视。“包容性发展”问题涉及面较宽，从静态的视角看，要从提供更合理的分配政策入手，使底层民众能够更为公平地参与发展利益的分配。而从动态的视角来看，则更应重视如何提升边缘社会群体和欠发达经济区域参与主流经济发展的创新能力。在该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进一步显示了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在创新管理领域中的开拓、务实精神和走在时代前列的引领作用。

近年来创新基地搭建了一流的国际创新合作网络。与剑桥大学制造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哈佛商学院、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百森商学院、法国EM里昂商学院、马里兰大学商学院、隆德大学商学院、CIRCLE、SPRU、加拿大IDRC等国际一流高校、机构及海尔集团、中集集团等领先的创新型企业等建立了紧密的学术合作关系，将中国的研究更积

极有效地融入国际主流学术网络。形成了“以四个联合研究中心为依托，以三大系列国际会议为平台，以紫金创新论坛和青年创新论坛为特色”的产学研结合的国际一流创新合作网络。

“四个联合研究中心”是指浙江大学—剑桥大学“全球化制造与创新管理”联合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海尔集团“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联合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中集集团“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联合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美商 IEG 集团“创新与创造力开发”联合研究中心。

“三大系列国际会议”是指本基地主办的技术与创新管理系列国际会议（IS-MOT）、全球化制造与中国（GMC）国际会议、中国创新学术网络国际会议（CICALICS）等三大系列国际会议。

“十一五”期间，创新基地与科学出版社合作，在国内推出了“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系列丛书，现已经出版 11 部，形成了以“二次创新—组合创新—全面创新”为核心的较为完整的原创性中国特色创新管理理论体系，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智力支撑和决策参考。

值此“十二五”的新开端，我们针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国际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面临的新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结合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推出此新一轮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丛书。这是创新基地各位研究骨干辛勤努力、踏实工作的创新性成果的最新结晶，它们大多为高水平科研项目的成果，以实证研究为主，务实而不失创新。作者们都力图体现浙江大学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的“求是、创新”精神，展示自己的真知灼见，与各界同仁分享探索真理的快乐。

中国崛起，以其新时代的鲜明特征呼唤着我们去无畏地探索真理，用科学精神去解开现实中的奥秘，用求是的智慧去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细节之妙和科学规律。本丛书的出版期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带动国内创新管理相关研究的持续发展，亦期望以此丛书为桥梁，在无边界的研究群落中为更多的同道架起沟通、互动、争鸣、协同的桥梁。

吴晓波

目 录

总序

第 1 章 绪论	1
1.1 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和发展	1
1.1.1 非营利组织的特征与定义	1
1.1.2 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兴起与发展	2
1.1.3 国内非营利组织的兴起与发展	4
1.2 非营利组织发展面临的困境	6
1.2.1 资源困境及其成因	6
1.2.2 能力困境及其成因	8
1.3 非营利组织的适应性战略	9
1.3.1 进入非营利组织孵化器进行孵化	9
1.3.2 与企业的跨部门合作战略	10
1.3.3 非营利组织的市场导向战略	10
1.4 本书内容安排	11
第 2 章 理论基础	14
2.1 非营利组织孵化器	14
2.1.1 孵化器理论基础	14
2.1.2 非营利组织孵化器理论	17
2.2 非营利组织与企业跨部门合作	19
2.2.1 非营利组织与企业跨部门合作的内涵	19
2.2.2 非营利组织与企业跨部门合作的分类	20
2.2.3 非营利组织与企业跨部门合作实施的相关研究	21
2.2.4 非营利组织与企业跨部门合作绩效的研究	22
2.2.5 非营利组织与企业跨部门合作研究的简要述评	24
2.3 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	24
2.3.1 企业市场导向研究视角	25
2.3.2 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的概念界定	28
2.3.3 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的测量	31
2.3.4 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的前因变量	33

2.3.5 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对绩效的影响	36
2.3.6 对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研究的概括与评介	39
2.4 资源依赖和组织合法性：组织战略选择根源	40
2.4.1 资源依赖理论	40
2.4.2 新制度主义理论与组织合法性	45
2.5 本章小结	52
第3章 NPI 对非营利组织的作用机理研究	53
3.1 NPO 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理想关系	53
3.1.1 概述	53
3.1.2 NPO 与政府的理想关系	55
3.1.3 NPO 与企业的理想关系	56
3.2 我国 NPO 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现状	58
3.2.1 NPO 内部问题	58
3.2.2 NPO 与政府的关系现状	59
3.2.3 NPO 与企业的关系现状	61
3.3 NPI 协调 NPO 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作用机理	62
3.3.1 NPI 协调 NPO 与政府的关系	62
3.3.2 NPI 协调 NPO 与企业的关系	63
3.4 我国 NPI 对 NPO 的作用机理	63
3.4.1 我国 NPI 的产生背景	63
3.4.2 我国 NPI 的功能定位	65
3.4.3 我国 NPI 的功能分析	66
3.5 本章小结	72
第4章 NPI 对非营利组织孵化的案例研究	73
4.1 案例背景	73
4.1.1 上海 NPO 发展现状	73
4.1.2 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 (NPI, 恩派) 简介	75
4.2 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的功能分析	77
4.2.1 对 NPO 进行全方位的能力建设	77
4.2.2 构建 NPO 与政府沟通的桥梁	79
4.2.3 加强 NPO 与企业合作, 建立公益创投平台	80
4.3 本章小结	81
第5章 非营利组织与企业的跨部门合作战略	82
5.1 非营利组织与企业跨部门合作的动因	82
5.1.1 合法性与跨部门合作	82

5.1.2	资源依赖与跨部门合作	83
5.1.3	非营利组织参与跨部门合作的动因	84
5.1.4	企业参与跨部门合作的动因	85
5.1.5	跨部门合作动因的案例分析：“多背一公斤”与联想集团	86
5.2	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合作的效能机理	87
5.2.1	非营利组织与企业跨部门合作的协同网络	87
5.2.2	协同网络对非营利组织绩效的影响	89
5.2.3	案例分析——彩虹文化发展公司与浙江省慈善总会合作	95
5.3	本章小结	96
第6章	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合作的风险与控制	97
6.1	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合作风险的成因	97
6.1.1	不同模式跨部门合作联盟的博弈关系	97
6.1.2	合作联盟的风险成因分析	102
6.2	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合作风险的控制	108
6.2.1	关于联盟风险的控制对策的既有研究结论	108
6.2.2	风险控制措施	108
6.3	案例分析——西安宝马彩票事件	113
6.3.1	案例描述	113
6.3.2	案例分析	114
6.3.3	启示	117
6.4	本章小结	117
第7章	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的动因与作用机理	119
7.1	资源依赖视角下的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动因	119
7.1.1	资源依赖理论的主要观点	119
7.1.2	非营利组织的资源依赖特性	120
7.1.3	市场导向作为非营利组织资源依赖的战略反应	121
7.2	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影响组织绩效的机理	122
7.2.1	卓越绩效的理论观点	122
7.2.2	市场导向作为卓越绩效的来源	124
7.2.3	组织创新的中介效应	126
7.2.4	市场导向、创新对绩效的影响	126
7.3	概念模型的发展	127
7.4	研究假设的提出	129
7.4.1	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与组织绩效	129
7.4.2	非营利组织创新与组织绩效	131

7.4.3 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与组织创新	132
7.4.4 环境变动的影响效应	134
7.5 本章小结	136
第8章 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与绩效关联的实证研究	138
8.1 样本与分析方法	138
8.1.1 样本与数据收集	138
8.1.2 变量与测量	139
8.2 实证结果的初步分析	141
8.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141
8.2.2 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144
8.3 结构方程建模分析	149
8.3.1 结构方程模型的设定	149
8.3.2 结构方程模型的评价	153
8.3.3 假设关系的验证	157
8.3.4 变量间的影响效应分析	160
8.3.5 各绩效维度的理论模式分析	162
8.4 环境变动的调节效应检验	164
8.5 本章小结	166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67
9.1 研究结论：组织成长与战略选择	167
9.1.1 进入孵化器培育	167
9.1.2 非营利组织合作导向	168
9.1.3 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	170
9.1.4 组织成长及其战略选择：一个权变模型	171
9.2 政策建议	172
9.2.1 非营利组织	172
9.2.2 企业	173
9.2.3 政府	174
9.2.4 非营利组织支持性组织	174
9.2.5 社会	175
参考文献	176
后记	194

第1章 绪 论

1.1 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和发展

1.1.1 非营利组织的特征与定义

非营利组织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POs) 也称“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非政府组织”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第三部门” (third sector)、“志愿部门” (voluntary sector)、“免税部门” (tax-except sector)、“独立部门” (independent sector) 等,是介于政府和营利性组织之间的社会组织的总称。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官方名称为“社会组织”,其中,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大类。

Salamon 指出,非营利组织应具备以下特征:①组织性,强调这些机构具有一定(正式)的、合乎法律的制度和结构;②私有性,即这些机构都在制度上和国家分离;③非营利性,即这些机构不向它们的经营者或所有者提供“利润”;④自治性,即这些机构基本上都是独立处理各自的事务;⑤志愿性,即机构的成员不是法律要求强制组成的,这些机构接受一定程度的时间和资金的自愿捐献。

在这些特征中,“私有性”、“非营利性”被认为是非营利组织的基本特征,而“组织性”则是其根本前提,这几大特征基本是公认的,但“自治性”和“志愿性”这两条特征则因国家、地区的背景不同而有所变化。例如,日本学者就结合亚洲国家国情,定义了适合亚洲的非营利组织六大特征,即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发型、持续性、利他性、慈善性,突出了以发展中国家居多的亚洲非营利组织扶助救济的重要作用(王名和贾西津,2003)。

在中国,符合理想标准的非营利组织数量较少。例如,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组织(行会、协会),往往因其官方背景而缺乏志愿性与自治性;同时,大量的未能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草根组织及挂靠、依附于其他机构的组织,虽在其他特征上与理想的非营利组织有着极强的共性,却没有最基本的法律地位。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国的特定情境下,对非营利组织的界定可以稍微放宽,在本书中,我们将其定义为:以共同利益追求(使命)为前提,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由成员自愿组成的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组织。

1.1.2 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兴起与发展

1. 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历程

关于非营利组织产生于何时, 争议较多(秦晖, 2004), 不过, 1942年在英国成立的英国乐施会(OXFAM)被认为是跨国非营利(非政府)组织产生的重要标志。^①但直至20世纪70年代, 非营利组织才在各个发达国家蓬勃发展, 并开始扩散至第三世界国家, 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所谓的“结社革命”, 并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下面, 我们从文化传统、社会经济背景两个层面出发来简单回顾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历程。

首先, “结社革命”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产物, 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内, 它是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基督教传统、人道主义传统及慈善传统是西方非营利组织的滥觞(Young, 2010)。在西欧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前, 基督教是其最重要的权力和财富中心, 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着秩序维系者的角色。基督教历来强调的是行善、怜悯。因此, 在中古时期, 基督教堂和修道院不仅是发放救济物资的主要场所, 也是人们学习与进行艺术活动的中心, 甚至还是各类农业技术的传播点。时至今日, 基督教虽然失去了其政治、经济上的中心地位, 但是其强调怜悯、救济的教义在西方国家仍然有着很强的号召力, 且仍然发挥着道德教化的社会服务功能。其博爱与利他的情怀, 也仍在不断地激励着人们帮助弱者。

人道主义传统源于国际红十字运动。1856年, 瑞士银行家杜南在目睹了战争的惨烈之后, 决定建立一个可以进行战场救护工作的组织, 以减少现代战争的杀戮以彰显人性。1864年, 16个欧洲国家签署了《日内瓦公约》, 强调了医务工作者可进入战场且不受伤害的权利。伴随着“人权”理念的传播, 后期的人道主义者在继承杜南衣钵的同时, 更加强调法国大革命传统的“普世的友爱”。人道主义与基督教传统一样, 有着很强的精神感召力, 吸引着一批批志愿者们。

慈善传统(民间的)与基督教救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它是近代才有的产物。19世纪开始, 设立慈善基金成为不少富翁们的首选。慈善基金与教会救济最大的不同是它的关注点在于公共事务, 如教育、法律、科研、环保及宗教等, 而不是对真正不幸者的帮助(这些任务大多为国家所承担)。从此以后, 基金会开始取代教会成为西方慈善事业的主要支柱(秦晖, 2004)。

其次, 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迅猛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按照莱斯特·萨拉蒙(2002)的看法, 四次危机与两次革命性的变化推动着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及现代福利国家危机是西方国家公民社会重新受到重视

^① 正如下文所分析的, 早在欧洲的近代甚至中古时期, 已有了各类介乎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组织, 这些组织多为各类行会, 往往代表小团体之利益, 从广义而言, 也属于非营利组织(秦晖, 2004)。

的一大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凯恩斯主义被奉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时的圭臬,政府干预成为一种潮流。伴随着政府干预的是政府规模,尤其是行政部门规模的不断扩大,形成了所谓的“行政国家”。但很快人们便发现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的同时,自身也暴露出了不可避免的问题,当“滞胀”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初困扰着西方各国时,“政府失灵”问题成为了众矢之的。与此同时,以西北欧为代表的福利国家政策,也因为经济增长放缓、财政压力增大而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人们普遍感到国家并不能取代社会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于是,一种依靠社会自身力量、通过社会合作来达成目的的组织开始开辟出一条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社会问题丛生不同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是发展危机。两次石油危机与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处境十分艰难。第三世界国家在面临经济、社会问题时的束手无策使得大量的国际性非营利组织有了进入这些国家以促进其经济社会问题解决的机会。此外,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不少人,也开始努力仿效海外,组建非营利组织以克服困难。

环境问题在全球的加剧也被认为是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催生剂”。无论是森林锐减、土壤沙化,还是水体污染,都严重威胁着全球各地人们的生活健康与生命安全。政府在应对这些问题时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间断性,并且难以有效根治。民间力量开始不断地发挥自身的首创精神并投身于环保事业,一个重要的信号是,在西欧兴起了广泛的环保运动及其代表“绿党”。

非营利组织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是在这些国家政权遭遇合法性危机之时。国家的权威逐渐失去人们的信任,人们相信只有依靠自身才能满足自己的社会与经济需求,于是各类自称非政府的组织(为强调其与政府的对立,从而获得合法性来源)不断涌现,通过各种行动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科学技术引发的通信革命,使得人们的交流变得更为广泛,志同道合的人们可以打破时空的藩篱而深入交流并开展积极的合作。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危机前的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中,产生了一批中产阶级,他们构成了这些国家的早期非营利组织活动的中坚。

2. 国外非营利组织现状

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西方及一些新兴国家的重要社会力量,在社区建设、环境保护乃至政策制定等社会公共议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甚至在欧洲,“绿党”已经由社会力量变为政治力量,成为政治舞台中的一颗新星。非营利组织成为各国重要社会力量的依据是其数量的急剧增加,《经济学家》杂志2001年的报告显示,当年国际性的非营利组织数量达到了30 000个。在美国,1987~1997年的十年间符合免税标准的非营利组织的数量以5.1%的速度在上升,至1997年其数量达到了734 000个。甚至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俄罗斯,非营利组织数量也达到

了 65 000 个。表 1.1 显示了在 2005 年一些国家的每万人所拥有的非营利组织数量。

表 1.1 部分国家每万人非营利组织数量汇总 (单位: 个)

国家	中国	美国	法国	日本	新加坡	阿根廷	巴西
每万人非营利组织数量	2.1	52	110	97	14.5	25	13

资料来源: 李立国. 2005. “中国民间组织评估体系专家论坛”上的讲话//康晓光, 冯利. 2011. 2011 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

数量上的增长,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非营利组织已成为一股重要的经济力量。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非营利部门比较项目的数据, 至 2000 年, 在被调查的 36 个国家中, 非营利组织的总支出达到 1.3 万亿美元, 占这些国家 GDP 的 5.4%; 同时, 这些组织还吸纳了约 4550 万的全职就业人员, 占经济活动人口的 4.4%, 其中, 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 7.4%, 发展中国家与转型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为 1.9%。此外, 在 36 个国家中还有 1.32 亿人在从事着志愿活动。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不少发达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手段, 如法、德、荷、英四国的新增岗位中的 40%是由非营利组织提供的。

非营利组织的迅猛发展势头在最近十几年内有增无减。仅以美国为例, 根据独立部门与美国都市研究所出版的《非营利组织年鉴》, 1998 年, 美国约有 120 万个非营利组织, 其中, 有 1090 万名雇员, 创造的收入占全美总收入的 6.1%, 约为 4436 亿美元。而该机构在 2008 年的年鉴数据显示, 美国已有非营利组织达 190 万个, 雇员有 1290 万人, 雇员人均工资达到了 34 339 美元, 其工资总额占全美工资的 8.1%, 这些非营利组织贡献了美国 5% 的 GDP, 逾 7000 亿美元。

1.1.3 国内非营利组织的兴起与发展

1. 国内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如果我们放宽对非营利组织的界定标准, 那么可以了解到中国现代或者近代意义的非营利组织源于清末民初 (俞可平, 2006)。以历史事件为标准, 中国非营利组织之沿革可大致划分为产生期、低潮期、复兴期及高速增长期。

产生期 (20 世纪初至 1949 年)。这一时期的中国, 国内国际各类政治势力斗争不断, 救亡图存与民族启蒙成为两大主题。政治分裂的局面在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同时, 在客观上为各类非营利组织的产生提供了不少有利条件。

有人统计, 这一时期的中国存在着约六类不同性质的非营利组织, 分别为: ①行业协会, 包括各类“会馆”、“行会”, 主要有传统的手工业、早期工商业者组成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自治组织及民族资本主义兴起后的新型行业协会两类; ②互助与慈善组织, 包括各类“互助组”、“合作社”及协会, 一部分由传统的互

助组织演变而来,一部分由外国传教士所建;③各类学术性组织,包括“学会”、“研究会”、“学会”等,一部分源于洋务运动,一部分源于“五四”运动及后期的新文化运动;④文艺性组织,包括各类剧团、社团、棋会,由文艺界人士所建立,如著名的“西泠印社”;⑤传统的民间结社,包括哥老会、青帮、洪帮等会党;⑥政治性组织,各类学联、工会、妇联、青年团等,以及与之相对的“三青团”、“干社”,抗战爆发后,各类救国性组织也纷纷建立(吴东明和董西明,2007)。

上述组织中既有中国传统的组织,也有受到“西学东渐”影响后组建的组织,还有因战争而建立的组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这一兼具本土与国际特色的组成结构,在今天仍是中国非营利组织最大的生态面貌特征。为统一管理这些组织,1932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了《修正民众团体组织方案》,来规范对其的管理。这或许是中国现代第一部有关非营利组织的法规。

低潮期(新中国成立后至1977年)。这一时期尽管也存在着一一些社会团体,如工会、妇联等,但是这些组织多为各类党政机关的附属机构,归属党政系统领导,毫无独立性而言。整个20世纪50年代,各类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极少,全国性的才44个,直到1965年,也只有不到100个,地方性社团有6000个。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社团都被取缔,处于“瘫痪”状态。

复兴期(1978~1989年)。改革开放后,各类非营利组织随着各类体制的放开而产生,数量、种类、独立性等较先前都有所增加,而合法性也有所加强。据估计,1989年,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数量达到了1600个,地方性的组织也有20多万个,分别为1978年的16倍与33倍。

高速增长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持续与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快,社会分层日趋明显,各类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这些问题往往是政府与企业所不愿或无力解决的。各类非营利组织应运而生,且呈现“井喷”态势(王名和刘求实,2007)。1998年,为进一步规范管理民间组织,民政部出台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法规。

2. 国内非营利组织的现状

进入21世纪后,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呈现跨越式增长态势。据民政部统计,2009年,我国登记注册的非营利组织数量达到了42.5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3.5万个,民办非企业18.8万个,基金会1780个。不少人认为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有观点认为,我国非营利组织数应该达到803万个,其中,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各类组织26.3万个,除去八大人民团体(工会等)的基层组织5378424个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文艺界联合会等准政府社团的基层组织1338220个,还有各类“草根”组织,如学生社团、社区文娱团体、业主委员会及网上团体等758700个(康晓光和冯利,2011)。学者俞可平(2006)

指出,由于我国存在着大量未能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所以真实的非营利组织数量难以确定,但保守估计这些所谓“非法”组织的数量至少达300多万个。

此外,截至2009年,我国各类社会组织固定资产总值约1089亿元,收入1247亿元,增加值约500亿元。全国社会组织当年有专职工作人员540万人,兼职工作人员500多万人,还有注册的各类志愿者2500多万人,基本形成了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门类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

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非营利组织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无论是每万人组织密度、组织发育完善程度,还是社会、经济影响力,都与西方国家甚至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非营利组织有着不小的差距。

1.2 非营利组织发展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国内非营利组织,尤其是公共服务、公益事业、工商服务类的组织的发展势头迅猛,在很多领域都起到了对政府和市场的“拾遗补缺”的作用。但 these 组织在成长壮大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类挑战,资源困境和能力困境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两个。这两类问题往往导致所谓的“志愿失灵”,使得非营利组织难以完成其使命,甚至面临解散的风险。因此,有必要了解国内非营利组织的资源困境与能力困境及它们各自的成因,并为这些组织提供解决相应问题的可能方法。

1.2.1 资源困境及其成因

所谓资源(resource),是指非营利组织在特定环境(包括自然、社会环境)约束下将自身使命转化为具体目标并予以实施完成所必需的各类人力、财力、物力。而非营利组织的资源困境便是指其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所遇到的在制度环境、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的困难。合法性不足与对外部资源依赖过度,是国内非营利组织面临资源困境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合法性不足。根据中国现有的制度环境,有学者将合法性分为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社会合法性、法律合法性四大类(高丙中,2000)。其中,法律合法性对组织资源获取影响很大。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非营利组织除了面临传统的资源困境外,还存在着不少政策困境。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当前的制度环境对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有着制约作用。当前制度环境主要从三个方面限制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一是准入限制;二是支持不足;三是管控过严。

准入限制。当前我国并未形成较为完备与合理的有关非营利组织管理的法律